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二三期 ——  
(二〇〇六年九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09a)

---

【史海钩沉】李达“三家村”案四十周年祭	湘 人
【不堪回首】“老高三”四十年情结	吴 敏
【难忘岁月】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 (之四)	刘光耀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海钩沉】

### 李达“三家村”案四十周年祭

• 湘 人 •

“三家村”是上一世纪6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作家廖沫沙三人写作的集体笔名，但1966年“文革”伊始，他们三人便被打成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家村”。“三家村”“黑帮”由此风行一时，李达“三家村”就是这南北呼应的第二个“三家村”。

#### ◇ 李达“三家村”的泡制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发表。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校党委书记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

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李达，生于1890年，时年76岁。身患高血压、糖尿病、肺气肿、胃病等疾病。他从1918年为反对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率领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先遣队回国与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人共同发起有2000余名北京各院校学生参加的向段祺瑞政府的示威请愿这一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反帝爱国活动起，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他是五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披肝沥胆，大呼猛进，作出了重要而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成就蜚然、英名远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朱劭天是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资深革命家。他读高中时就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读大学时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被推荐为燕京大学队部负责人。1939年去延安。随后两度担任陈云的秘书。1947年4月就任东北铁路总局经理部部长。1949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财务局局长，随后又兼任北京铁道学院首任院长。1958年被派来武汉，先任中南财经大学校长，接着担任该校改名为湖北大学的党委书记，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60年冬，他率省委工作组来武大整风，接着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1965年初调出武大，担任中南局科委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主任。他是从广州被押回武大作“三家村”“大老板”的。

何定华，本名方浣，192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加入日本共产党。他与胡风、聂绀弩等人在日本组织《新文化研究会》，并出版反日刊物《文化斗争》。1933年因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及留学生反日运动被日本警方逮捕，并被驱逐回国，转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到延安陕北公学任教，并参加解放战争。1958年调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他是经历过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武汉大学，事无巨细，他都尽职尽责，连寒暑假也不休息，是员工公认的武大“管家婆”。

牛永年，新四军出身。1949年11月成立的中原大学财经学院负责人之一。该院改建为中南财经学院和湖北大学以后，担任统战部长。1961年调任武大党委办公室主任。

庄果所谓“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原来武大的“运动”早已开始，李达“三家村”也早在泡制！

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要在中南地区搞一个“有权威的、有影响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立面”来打。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就在这个会上，他点了李达的名，并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王任重在其百花村住所听取陆某汇报她所搜集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并指示她将汇报的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以陆某署名的这封信，诬陷“李达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幌子，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黑货”，攻击李达“通过编书、学术讨论等方式”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诬称“李达所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一所反毛泽东思想的据点，所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风，都是在那里吹出来的”；同时又把李达1956年重建武大哲学系的目的说成是“以此为据点与主席思想唱对台戏”，把哲学系的教师说成是“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打手”。另一方面，又虚构李达与朱劭天、何定华、牛永年之间的“黑组织关系”，说他们“狼狈为奸，组成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核心，李达是这个核心的王牌”，“朱、何、牛利用李作王牌与中央、省委相抗衡”等等。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点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他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

28日，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5月9日，王任重在北京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写信说：“关于李达的揭发材料一份，我加了一点按语。请审阅。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当时的邓小平可能不了解真实情况，但又不能不支持业已开始的所谓学术批判，便口头通知王任重并批复湖北省委“同意任重同志的意见”。还指示对批判李达“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党内进行批判，第二步在学校进行批判，第三步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王任重后来说：“我在五月在北京开会时，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问主席是否同意批判李达。邓小平口头通知我，说他当面问过主席，主席说，可以在校内批判，但登报不登报点名还要考虑。”

5月上旬，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陶铸讲话说：“北京日报揭露以后，新的开头从这里开始，比57年要大，意义深远得多，要拿一定力量来搞，是百年大计，可以抽力量。”他强调说：“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参加扩大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省委要以武大作为样板，取得经验。”

12日，陶铸在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其中主要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会议期间，张体学说：“我想把李达免掉，换成人大常委，结果还是校长。共产党不把校长当回事。”

他还说：“有个民主人士说，李达就是靠毛主席吃这碗饭的，另外靠反马列主义。”当有人反映李达说他有错误要向毛主席作检讨时，张体学说：“要批判他，开斗争会。什么向主席检讨？先向我们检讨了再说！”当武大宣传部副部长柳佑提到“武大问题的艰巨性”时说：“（李达）上面有人支持，我们也在省委找支持”时，张体学说：“党内斗争是相当复杂的，我劝你们把《论党内斗争》的书看一看。”“这次有六成把握，大概没有问题。再发展提高可能有七成，八成，九成。失败为成功之母！”“你们坚决大胆地搞，即令运动将来搞错了，也不要你们检讨，不处分你们，我们去检讨。”他还说，李达的书是驳得倒的，不外抄书的本事加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把李达的政治观点“搞得很臭很臭”。这次“要彻底揭，新老账一起算！”“我向道琦说了，这次武大搞不好，我从长江大桥跳下去！”“阶级斗争是不讲情面的，你死我活嘛！”“运动开始会死些人。你自己死，能怪我呀？”

其实，这一期间，无论是陶铸还是王任重、张体学以及许道琦，对打倒李达仍然是有顾虑的。陶铸在中南局会议期间也说过这样的话：“李达可以批判，但要请示主席。因为李为著名人士，过去传播马列主义。”“过去主席表扬过他。”王任重则三次当面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第一次在杭州会议上问，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再问，毛泽东仍不表态；接下来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王任重还就此事不无得意地介绍“经验”说：“你只要坚持多问他几次，他就会点头的。”但是，张体学却还有“两点顾虑”：第一，把李达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不知中央意见怎样？第二，李达岁数很大，又有病，一批判可能把他弄死。许道琦甚至说：“以前咱们对他有点怕……”“怕”什么呢？一年多后，

他接受为李达翻案的群众组织盘问时才说：“中南局会议下决心打李达，我们当时是有顾虑的。我所说的‘怕’，把话说透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李达和毛主席有关系，主席很器重他，表扬他，主席还叫他编书嘛！……后来我们决定打他，就不许他走。怕就怕他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

中南局会议还没有结束，5月10日下午，武大哲学系工作组王某就召集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余志宏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全体人员开紧急会议，宣布李达有问题，要向群众交代，编书工作停止，研究室关门。王某厉声训斥说：“有人（指李达）在那里疯狂反毛泽东思想，你们是什么党员？为什么向党组织不汇报、不揭发？研究室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是在反毛泽东思想？真是不知羞耻！”他们宣称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党支部是“国民党支部”，是“反党活动的黑司令部”，勒令立即解散；宣布研究室人员的“惟一出路”就是“彻底揭发李达的反党罪行”！

这天晚上，庄果动身去广州参加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前，又去李达寓所已正式通知李达：停止编书，不许回北京，老实交代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立即关门。

第二天，哲学系工作组便在教工中进行“战斗动员”，开始点名哄斗，进行关于李达问题的逼供。此后，李达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被打成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李达主要助手陶德麟被打成“李达的忠实走狗”、“帮凶”，研究室其他人员，除了一两个“起义”的以外，也被打成“黑帮分子”。哲学系余志宏、李其驹等一批干部、教师则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黑干将”、“黑爪牙”，“总头目”就是李达。

根据当时的统计，在校党委15名常委中，被打成黑帮的有11名，占74%；在武大1340名教职工中，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有214名，还有准“黑帮”即内定黑帮（已准备了材料或已被抄家、减薪、批斗但尚未正式打成黑帮）88名，共计302名，占总人数的22.5%。就是说，教职工几乎每四人中就有一个“反革命”。还有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生也被打成“三家村”“黑分店”不计在内。

武大成立了“李达专案组”，不仅车轮战式地逼供，汇集整理李达的一批批“罪行”材料，而且抓动态，对李达及其周围的人进行严密监视。他们的言行每日被汇报，分别载入绝密的《运动动态》和《李达动态》。其中，李达的秘书刘某又是省委和武大工作组重点控制对象。

庄果、陆某等人多次找刘某谈话。他们严厉批评刘某5月1日仍旧给中央组织部写信汇报李达情况是“违反纪律”的错误。陆某声色俱厉地说：“你知道李达是中央管理的干部。所以目前的一切都不许再向中央反映，必须绝对保密！”他们逼迫刘某对李达问题性质明确表态；进而威胁利诱，交代刘某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即伪装同情李达而暗中监视李达。于是，刘某被迫执行这项特别任务，从5月1日起，每天详细书面汇报李达的全部“动态”，载入“绝密”的《李达动态》。

5月16日，中南局动员会议一定下盘子，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明又找刘某“个别谈话”，强调有关李达的情况必须绝对保密，不许再写信向中央反映。他指示刘某：“在工作中完全听从领导小组的安排，他们决定如何搞就如何搞，忠实执行，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根据需要办。除此而外不能对任何人讲，除非省委找你，不管系、学校、别的领导，任何人找你，你均不讲。只有领导小组、庄果、陆某及他们指定与你联系的人才可以讲。”并说明“这是省委的意见”。罗明还要求刘某不在党内外任何会议上谈李达和自己的思想情况。“你在各种场合表态的时候应遵照一个原则，即不要引起领导小组以外的人员对你的怀疑，不要引起李达对你的怀疑。”“至于将来让你出来讲话，讲什么，由领导小组安排。”罗明还要求刘某“继续如实地及时地向领导小组反映情况”，“甚至只言片语，如实写出来交领导小组，愈快愈好”。“李达以外其他任何人，不管是谁，时间不限，你直接、间接听到看到的情况，均记录下来，如实向领导小组反映。写

成材料。”

刘某就这样被迫地执行了作特务、写动态、整材料的任务。但庄果、陆某等人对他仍然不放心，又以“保卫”为名，派学生蒋某、黄某二人住进李达寓所。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严密监视李达及夫人石曼华，并且同时监视刘某，他们所写的“秘密汇报”就汇报了刘某的某些“可疑”言行。直到李达被迫害致死，刘、蒋、黄三人共写了“李达动态”约一百份，逐日送工作组，再由“李达专案组”负责人刘加工整理，共列印有关李达的《运动动态》、《内部参考》共三十多期，并且每一期都送王任重，王也几乎逐期“批示”。

5月25至26日，武大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5.16”通知，分析运动以来的思想动态。校党委副书记蒋某强调有问题的人的唯一出路是揭发交待，那些仍然“无动于衷”、“执迷不悟”乃至“对运动刁难、说讽刺话”的人，要立即猛醒过来！27日，原武大党委第一书记、早已于1965年初调离的朱劭天被从中南局科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岗位上揪回武大，并被指控为“武大三家村”的“老板”。同时，省委又宣布常务副校长何定华停职反省。1964年调任北京某专科学校任党委书记的原党委副书记周健也揪回打成“三家村”“黑帮”。

所谓李达“三家村”，无疑是莫须有；对李达、朱劭天、何定华等当事人，也都是天大的冤枉！李达说：“讲我是‘三家村’，真冤枉。”这是“他们把十几年来朱、何、我三人讲的话，东拼西凑拉一些话，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三家村’，不相干的话放在一起就算问题了。”

#### ◇ “万炮齐轰”李达“三家村”

6月3日武大文革动员大会这一天，从早晨7点到晚上8点，便有一拨拨人去李达寓所声讨，张贴大字报。从这一天起，学校还在李达寓所安高音喇叭，对着李达的书房和卧室广播。

6月7日，武大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王任重来武大并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他还表态说：“这次武大问题不解决，省委自动解散！”李达被押去参加大会，张体学在会上讲话后同李达个别谈话说：“你的问题，就是1958年写了一篇文章，是右派立场。这次你好好检查，触及灵魂，只要有认识，我个人意见，武大校长不做了，去当人大常委，还是一级教授，工资照发。”

连日来，不断有一拨一拨人在李达寓所门外敲锣打鼓声讨，喊口号、唱歌。李达开始受不了了。6月12日，他对秘书说：“我请求把我送拘留所去！我现在是惊弓之鸟，听到门口有人喧哗，呼口号，打倒李达，心里很不安！这如何来写坦白申辩材料，把我送拘留所，让我安静反省。”

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并被摄像，还三次被按下头来斗争。就在这一天，省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

同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发表报导和社论。其中《湖北日报》第一版头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发表王任重6月7日对武大的那个题词；下半版是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报导说：“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倡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

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武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复地进行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激烈的斗争。”第二、三版则发表了武大一些人揭露批判武大的‘三家村’黑帮的文章和大字报。

14日，《湖北日报》第一版通栏标题报导“同声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众口齐诛珞珈山的‘三家村’黑帮，全省人民坚决声援武大革命师生，横扫一切害人虫”。第二、三两版则是报导声援情况。15、16日的《湖北日报》继续以整版的版面报导声援情况。

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导：“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但此时报刊电台对李达尚未点名，而以“某资产阶级权威”代指。6月28日毛泽东来汉时，工作队（按：6月中旬以后，工作组扩大为工作队）还派人将李达住宅内外关于“打倒黑帮头子李达”一类标语、漫画、大字报统统揭去，洗刷得乾乾淨净。究其用意，一是省委仍在请示毛泽东：“李达的问题，可不可以上报点名？”一是考虑毛泽东万一来武大视察，不至于有碍观瞻。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新老帐一起算”，打李达“三家村”也不例外。5月下旬，武大工作组派校党委办公室秘书侯某率领调查组，在湖南省委和组织部门的支持下，去李达家乡零陵县蔡家埠公社。调查组利用当地唐、李两姓的某些矛盾，使用威逼李达亲属的方法，得到了一些“材料”。他们返校报告说，李达对农民有“严重的经济剥削，划成地主大有希望”。

6月7日，这个调查组写出了《关于李达解放前后在湖南地区的反动罪恶活动的初步调查》。但工作组仍不满意这个“初步调查”，而是要就李达“是否应划地主分子”的问题“取得直接的证据”。

6月15日，侯某再赴湖南。这次是与李达家乡零陵地、县、区、社四级组成“联合调查组”，一进村就召开“揭发、声讨李达黑帮”会，迫使群众控诉李达“解放前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并由调查组人员代写“检举材料”。在李达的“地主”材料仍感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又让调查组成员之一的公社书记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编成“旁证材料”。最后由这位公社书记签署意见，将调查组中意的“材料”定为“可作依据”；不中意的则定为“仅供参考”。这样，到21日便取得了李达应划“地主”甚至“恶霸地主”的“直接的证据”：李达家的11亩水田被夸大为16亩，5亩旱地被夸大为11亩，出租3亩水田歪曲成16亩，李达亲属放的谷债、开的药店和织布厂被搬到李达名下，甚至被土匪杀害的妇女也被记到了李达的帐上。

联合调查组就这样写出了《关于李达家庭成分的调查报告》，同时又代替零陵县人民委员会起草了对这份调查报告的《批示》，于28日催促其开会通过，以零陵县人民委员会“66秘字第068号”正式文件发往武大。联合调查组的这份调查报告和零陵县人民委员会的这个批示，完全不顾李达自1947年起在湖南大学任教和其全家无一人乡的基本事实，决定“将李达的家庭成份由小土地出租改划为地主，给李达本人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李达在历史上脱党但始终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在那“怀疑一切”的时代氛围下，人们亦怀疑李达也一定有“大问题”。王任重《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加按：“李达同志的历史可不光荣啊！一九四九年以前你在哪里？”

在决定打李达的中南局会议上，庄果也预言：“按一般情况，李达一定是在大革命时叛党的。”

但是，工作组派侯某率领调查组调查李达的“历史问题”却出师不利。他们一进入湖南省公安厅，查出的则是1928年春湖南当局对李达的“通缉令”，在“人犯”李达名下，赫然写着：“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但他们根据工作组“从容易的地方下手”的指示，还是进展神速，写出了前述6月7日那份《关于李达解放前后在湖南地区的反动罪恶活动的初步调查》，认定“李达在解放前的历史是非常黑暗的”。

工作组又进一步诬陷“李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历史”。如不顾李达传播马列主义、参加发起建党、与陈独秀意见不合的事实，诬指他是“五四运动的右翼”、“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不顾马日事变后李达转到零陵家乡避难的事实，诬指他在长沙“安然无事”；不顾大革命失败后李达从武昌中山大学流亡上海法租界的事实，诬指他仍在武汉“当教授”；不顾李达在上海宣传马列主义并因此遭毒打住院治伤的事实，诬指他是“反革命‘围剿’的刀斧手”。

6月30日，李达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当日《湖北日报》头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这样，就便于同志们了解他们的反动言行，看透他们的反动本质，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们斗倒斗臭。”

这个“编者按”集中揭批李达说：“李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长期以来，他挂着‘老党员’、‘老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摆出‘名流’、‘学者’的架子，利用他窃取的领导权，一贯地、系统地、倡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和推行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阴谋把武汉大学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李达欠人民的债够多了，够长的了，应该进行彻底的清算了！李达实际上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假马克思主义，真修正主义。他在大革命时自动脱党，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重新找共产党，这段历史是很不光彩的，很值得怀疑的。解放后，李达到了武汉大学，他的所作所为又是怎样的呢？武汉大学有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革命分子，李达是他们的大老板，保护人。武汉大学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束缚，李达是这个搞D的制造者。武汉大学的‘三家村’黑帮阴谋篡夺学校的领导权，李达是这个黑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他们阴谋复辟和革命师生反复辟的斗争中，李达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反动的‘学阀’面孔，残酷地压制和打击革命师生。”

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分五部分即五个大标题，也就是李达的五大“罪行”。第一部分即第一个大标题是“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修正主义谬论”，包括“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大肆宣扬现代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的谬论”（按：“三和”是指赫鲁晓夫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和平过渡，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两全”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变成“全民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李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据点”，“反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二部分是“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包括“留恋旧社会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腐朽生活”，“一九五七年就煽风点火，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大跃进，咒骂大跃进是大后退”，“诬蔑人民公社，亲自指使分田到户，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第三部分是“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竭力丑化教育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包括“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政治挂帅，鼓吹只专不红”，“丑化教育革命”。第四部分是“为国内外修正主义辩护，替右派分子鸣冤，攻击文化大革命”，包括“咒骂史达林，吹

捧叛徒赫鲁雪夫”，“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替右派分子喊冤，攻击文化大革命”。第五部分是“抗拒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的路线”，包括“抗拒党的领导，抗拒省委决定，疯狂地与党争夺领导权”，“一贯仇视、排挤工农干部和打击革命的左派”，“一贯鼓吹和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路线”。

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一开篇就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份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接着进一步提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个材料共三部分即三个大标题，也就是“三家村”的三大“罪行”。第一部分即第一个大标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包括“否认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恶毒攻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宣扬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吹捧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分子，为牛鬼蛇神辩护”。第二部分是“恶毒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恶毒攻击党的教育方针”，包括“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第三部分是“他们是怎样篡夺领导权的？”包括“把资产阶级右派捧上台，实行教授治校”，“把无产阶级左派打下去，篡夺领导权”，“互相包庇，欺上压下，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

《湖北日报》8月28日第三版又用一个整版发表了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揭穿李达反共反人民的历史》。此文共五部分即五大标题：一、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二、可耻的叛徒，反革命围剿的急先锋；三、反共媚日的民族败类；四、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帮凶；五、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地主分子。

《人民日报》8月4日头版下半版则发表了署名“新华社记者”的通栏标题报导：《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的一面红旗——记武汉大学数学系半耕半读试验班同李达、朱劭天等黑帮作斗争中成长的经过》，9月5日又以第六版整版的篇幅发表批判李达的一组文章。“编者按”说：“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李达。”李达不仅是武汉大学校长，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它提出“我们一定要按十六条的规定，把李达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权威’斗臭、斗垮、斗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一组文章是：激扬《李达的叛徒嘴脸》，武哲文《民族败类，反共老手》，唐顺八《打倒李达这个土皇帝》，李定业《贫下中农的死对头》，《李达剥削农民的十大罪恶》（未署名）。9月11日，第四版则又发表了工农兵批判李达的文章。其中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罗田北丰公社某大队党支部书记丁凤英《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一文说：“李达指的是我的名，但骂的却不是我个人。他骂的是我们广大工农兵……李达这样疯狂，我们不怕！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一个李达，就是一千个李达，一万个李达，也不在话下！”

#### ◇ 李达罹难与“黑帮”“劳改队”

李达“三家村”从三个“大老板”到所有“黑帮”，既然已被打成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无疑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首当其冲的李达，被批判，被斗争，被断医停药，于当年8月22日奄奄一息之时才被送进医院，三天后于24日就惨离人世。也就是说，他从5月10日被勒令停止编书、交代问题，三个月零14天，就被迫害致死。25日晚上，在他担任了十四年校长的武汉大学，“校文革”



还召开了“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中共中央批复的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戴地主分子帽子的处分决定。李达夫人石曼华则被作为“地主婆”扫地出门，李达的存款被冻结，李达的家当被封存。她住进一间低矮、简陋、阴暗、潮湿的平房，开始靠拉板车每天一元的临时工收入维持自己与年幼女儿的生活，并且还经常受到居委会的批斗。

朱劭天曾被逼自杀，吃过一整瓶抗生素，结果被押到医院洗胃。他还被“逼供”而精神恍惚以至于错乱。

何定华则被逼跪马路，举白旗（意味着向“革命群众”投降）。随后又被押送“黑帮”“劳改队”。

所谓“黑帮”“劳改队”，是校文革将159名“三家村”“黑帮”（含少量所谓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在校内批判斗争之后，又于当年9月29日国庆前夕将他们押送武昌县（今江夏区）东升公社劳动改造，直到11月26日才返校。

在东升“黑帮”“劳改队”，校文革为“黑帮”规定的“劳动纪律”是：“1、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破坏捣乱者按现行反革命处理；2、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有事必须请假；3、劳动中要互相监督，努力改造思想，老实交代问题；4、努力学习党的政策，认清出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5、不准破坏集体财产和庄稼，否则从严处理。”这五条所谓劳动纪律，实际上就是所谓四类分子的“守法公约”。校文革要求劳改的“黑帮”一字不漏地背诵，每逢集合站队，管理人员就随意抽查；如背的稍大出入，就要遭到臭骂；只要“黑帮”做了所谓“错事”，管理人员就大吼：“站出来！站好！背劳动纪律给我听听！”这所谓劳动纪律的解释权和执行权完全操纵在管理人员手里：“黑帮”笑一声就是“乱说乱动”；申辩一句就是“不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如实说明情况就是“不老实交代”；无意踩了地上的两颗谷粒就是“损坏庄稼”……只要是管理人员不顺眼的就是“违反纪律”，就要挨骂、受罚、挨斗。

除了所谓劳动纪律，还有不成文的种种规定，如不准进厨房，不准靠近水井，不准三人以下单独行动，不准谈话，不准唱歌，不准在会下谈政治问题等等。还有一套严格的请假、报告制度，如大小便要请假，喝水要请假，洗衣要请假，添饭要报告，向社员借扫帚、借水桶要报告，发现别人“越轨”行为要报告等等。

此外，管理人员还采取了种种别出心裁的所谓防范措施。如有的队勒令“黑帮”把剪刀、小刀、剃须刀全部上交管理人员“代为保管”，有的队规定“黑帮”临睡前要躺在地铺上点名报数，有的队通宵开灯派人看着“黑帮”睡觉，有的队晚上在“黑帮”的房门上贴封条……实际上是制造恐怖气氛，企图从精神上摧毁“黑帮”。

东升“黑帮”“劳改队”实行全封闭管理：不许把劳改情况告诉别人，否则严加惩处；“黑帮”的信件收发由管理人员严密控制，许多队还规定“黑帮”的信件必须交管理人员审查，一旦发现“居心不良”的话语，立予追究。某医院寄给一个“黑帮”夫人病危通知单也被扣压。不准打听学校情况，有的队甚至还规定“夜里不准两个人睡在一床帐子里”，“晚上躺下以后不准交头接耳”。

在东升“劳改队”，“黑帮”除了劳动以外，几乎全部时间都被用于无休止的斗争会、“触灵魂”、写交代。

东升“劳改队”的斗争会是家常便饭，几乎是每日一小斗，数日一大斗。所谓小斗，是“黑

帮”互斗。这是校文革领导成员、原武大人事处副处长王某训练管理人员的一项“发明”。王某指示管理人员说：“白天让他们劳动，晚上就让他们狗咬狗。”所谓大斗，是开社员大会斗。这种大斗是选择所谓“问题严重”、“态度不老实”的校、系当权派“黑帮”作对象，以“杀鸡给猴看”，矛头指向全体陪斗“黑帮”。开斗前，被斗对象要自报姓名：“武大（或某系）反党反社会主义么毛泽东思想‘黑帮’分子某某某”，并自诉“反革命罪行”。这种斗争会常常伴随着武斗。例如，被从北京揪回的原校党委副书记周健在斗争时被罚跪。在东方红大队斗争何定华的大会上，四周密布武大管理人员和持枪民兵，制造恐怖气氛。管理人员说：“打你们，罚你们下跪都不算武斗。老实说，你们本来该枪毙，但枪毙你们浪费子弹！”

所谓“触灵魂”就是“逼口供”。方式一是自己触，一是相互触。要求是：第一，不许“空谈”，一定要交代他们需要承认的各种“罪行”，一定要坦白不愿劳改和仇恨管理人员的活思想；第二，不许“就事论事”，一定要上纲，一直要上到想搞资本主义复辟之纲。所有“黑帮”不仅都得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么毛泽东思想”，而且要承认是自觉的。出身不好的“黑帮”还必须承认“想反攻倒算，想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出身好的则必须承认是“蜕化变质”，“忘了本”，作了“叛徒”、“工贼”。校、系文革正是利用这种“触灵魂”、“无限上纲”的办法，捞取大量“材料”，成为给“黑帮”定罪的依据之一。

在校文革王某、陆某的授意下，“劳改队”还安插了“密探”，并鼓励告密。一方面，他们利用个别“黑帮”争取“从宽处理”的心理，叫他们监视别人的行动，他们的告密按“立功者受奖”的原则办理；另一方面，则是专门派一些具有“黑帮”身份的人暗中“做工作”，这些暗中“做工作”的“黑帮”就是密探。

#### ◇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武汉大学的“文革”有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李达“三家村”是中南局、湖北省委和武汉大学党委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打的，打李达“三家村”与武大绝大多数师生员工无关。而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则是武大师生员工中的群众组织搞的。与此直接相关的又是武大的所谓保守派与造反派也翻了个个儿：保守派是“外保内造”即外保湖北省委而内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造反派是“外造内保”即外造省委的反而内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因而在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分歧和斗争，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武大的文革现象。今日回顾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不是清算所谓保守派的错误，而是如实述说那一场感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彰显武大部分群众组织的那种人性的未泯和勇气！

1966年10月起，文革进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武大造反派组织在“抢”工作队和校文革保存的“黑材料”过程中，获得了李达“三家村”的许多原始材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50年代初期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修改李达《〈实践论〉解说》的部分手稿，还有工作队和校文革整理的《李达动态》以及何定华的几十本“日记”。于是，1966年底到1967年初，部分师生员工就开始秘密酝酿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期间，打李达“三家村”的王任重，原中南局第一书记和陶铸，也先后被打倒，这在客观上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提供了可能。

1967年3月2日，哲学系两位主要“黑帮”、前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余志宏、副系主任李其驹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约2万字的长信，系统报告了武大文革运动的情况。全信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王任重、刘仰峤在武大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内容包括“一个庞大的‘黑帮’队伍”，“王任重、刘仰峤在武大所扎下的根子”，“1961年以来‘刘仰峤集团’在武大究竟在干什么”，“给武大‘教育革命’运动定调子的两分重要文件”，“轰动全国的李达‘三家

村’是怎样‘揪出来的’”，“矛头向下，大抓黑帮”，“上窜下跳，死保刘仰峤”，“对抗《十六条》，加紧政治迫害”。第二部分是“哲学系问题在这次政治迫害中的重要地位”，内容包括“王任重为什么特别重视哲学系”，“陆舒e是怎样收集李达和哲学系的‘材料’的”，“王任重及其在武大的代理人是怎样定下李达和哲学系的关S的调子的”，“哲学系的‘黑帮’是怎样打出来的”，“王任重及其在武大的代理人强加给哲学系的‘罪名’是什么”，“目前我们的处境”，“李达和哲学系的关S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S”。这封信明确提出：“王任重等把李达当作‘武大三家村’的‘头目’来打，并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说成是李达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的司令部’，把武大哲学系说成是‘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这完全是王任重及其代理人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虚构出来的”。这封信于4月19日抄成数十张大字报在学校张贴。

4月10日，由武大一般干部张学义和王晓芳两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胆忠心战斗队”贴出长篇大字报《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罪行——关于王任重御用的原武大校文革在东升公社私设劳改营、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初步调查》。

4月13日，由哲学系主要“黑帮”余志宏、李其驹、萧捷父、陶德麟、康宏逵组成的“钟山风雨战团”与“赤胆忠心战斗队”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1966年4月至9月陶铸、王任重、刘仰峤在武汉大学“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情况的初步调查》。

4月16日，“钟山风雨战团”又贴出《炸开武汉大学阶段斗争的铁盖子——关于武大“黑帮”问题的十大疑团》。其中第三个大“疑团”就是打李达“三家村”：“武大运动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打出了一个耸动全国的李达‘三家村’。妙在这个‘三家村’，是早在运动前王任重在病床上卧听陆舒e娓娓汇报时，突然心血来潮，一言判定的（按：陆舒e回忆，有一天当她汇报说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都是“右派”时，王任重从床上一跃而起，狂呼：“李达就是个老不死！”实际上就定下了“三家村”），然后由庄果在运动刚开始（66年6月3日）的动员会上煞有介事地向全校公布的。当时广大群众，感到非常突然……事过境迁，怀疑增长：李、朱、何三人果真结成了‘三家村’这样一个反党阴谋集团的黑组织么？为什么以后始终没有揭出或公布他们之间的黑组织关S和黑组织活动？工作组出的‘三家村’的全部材料，为什么竟然没有他们组织‘反党阴谋集团’这方面的‘罪行’？‘村’在何处？无‘村’而说成有‘村’，是不是王任重在玩政治魔术？他这样有意虚构，又出于什么政治目的？他敢于这样一手遮天、一鸣惊人，是否背后还有指使者？”

4月20日，“万丈长缨社”贴出大字报《武大“揪黑帮运动”的一些历史原因》。大字报分八个部分：一、“刘仰峤1958年武大教育革命中干了一些什么”，揭露刘仰峤“大搞形‘左’实右，树立假‘红旗’”，“扎下黑根子，扶植一小撮”；二、“武大刘仰峤集团为什么那样顽固地抵制1961年的整风”；三、“1961年以来，谁是武汉大学积极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魁祸首”；四、“1963年李达和刘仰峤之争的实质是什么”；五、“1964——1965年期间，王任重、刘仰峤是怎样合谋改变武大领导状况的”；六、“1964——1965年期间，刘仰峤集团的主将在农村社教中干了一些什么”；七、“1965年6月，蒋南翔和刘仰峤主持的‘北京会议’说明了什么”；八、“1966年2——4月间，武大刘仰峤集团在王任重、刘仰峤亲自指挥下，忙了一些什么”。

5月1日，哲学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和“钟山风雨战团”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场反革命阴谋的序幕（陶铸、王任重、刘仰峤在武汉大学的一页密谋变天记）》。大字报分三个部分：一、“篡党夺权、布下杀机（1965，5——1966，1）”；二、“二月密谋、重重黑会（1966，2——4）”；三、“紧锣密鼓、杀气腾腾（1966，5起）”。

期间，武大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同时成立“李达专案组”、“朱劭天专案组”

和“何定华专案组”，进行大量的内查外调，逐一甄别工作队所整理的材料，为李达“三家村”辩诬。“李达专案组”主要由哲学系“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和“钟山风雨战团”负责，“朱劭天专案组”主要由数学系“农奴戟”兵团负责；“何定华专案组”则由笔者和三位“黑帮”分子即原历史系总支书记李植楠、原校办秘书李涵和数学系教师齐民友负责。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关键是为李达翻案。“李达专案组”尤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整理翻案材料工作。可以说，凡是工作队强加给李达的“罪行”，包括李达的家庭成份，历史问题，“三反”言行，一句话，只要是工作队“材料”所涉及的，“李达专案组”都派员予以重新调查和甄别。调查范围涉及李达长期的历史活动及其发生地零陵（今永州）、上海、长沙、桂林等等。例如，李达的“地主”成份，是工作队发动和组织、有当地组织部门参加的所谓“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而诬陷的，湖北省委又正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所谓“调查”做出开除李达党籍、戴“地主分子”帽子的“决定”上报中央、以“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批复的。因此要为李达辩诬和翻案，这又是关键。为此，“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多次派人赴李达家乡调查，终于使零陵县人民委员会于1967年12月18日发出（67）会民字第226号《关于撤销错定李达同志家庭成份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说：“李达同志的家庭成份，土改已经正式划定，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反映过他的成份问题，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不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偏听偏信了联合调查组的报告（连县人委的批示都是由工作组拟的），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现经武大革命造反派同志反复调查落实，原来的调查报告捏造和扩大了事实，田土、雇工、债利剥削等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更重要的是解放前三年他是大学教授（脑力劳动者），按照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土改时将李达同志家庭成份划为小土地出租成份，是完全正确的。……经我们讨论：去年6月28日，我会66秘字第068号文件对‘关于李达家庭成份调查报告’的批示和8月2日对‘李达关于所谓大恶霸地主问题的申辩’的批驳材料都是错误的，应该撤销，宣布作废。李达同志的家庭成份，应按土地改革划定的小土地出租成份不变。”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遇到了很大阻力，并且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阻力不是来自省委、校党委、校文革，因为这些机构已经被“造反”而失去了影响力；而是主要来自不同的群众组织。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既有所谓保守派，也有所谓造反派即后来武大“龙虎斗”中的“虎”派。特别是在“百万雄师”最盛的1967年夏季，李达“三家村”同“二·八声明”（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部”即“钢工总”、“九·一三工人战斗兵团”即“钢九一三”等群众组织2月8日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当时的所谓“大毒草”）和“钢工总”（所谓“反革命”）成了三个不能推翻的“铁案”。用当时的话说，要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为“二·八声明”翻案，为“钢工总”翻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除非公鸡下蛋！除非长江水倒流！

1967年夏，派性和武斗日趋激烈，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还特别涉及保护“三家村”“大老板”朱劭天、何定华及一大批“黑帮”的生命安全。那时，抄家、绑架、打人直至武斗是经常而随时发生的，“三家村”“黑帮”的人身安全成了大问题。以笔者参与保何定华为例，那时，我们先是像过去共产党做地下工作那样，有时把何定华安排在学生宿舍，有时安排在工人家里，并且一天换一个地方，但6月初，这种校内转移性安排也不保险了，于是只好由笔者直接安排“工人战斗兵团”胡国民同一位女工护送何定华去外地避难。他们先到南京，其时何定华亲弟方敏担任南京市革委会主任，但他却不敢接纳自己的哥哥。他们一行只好去西安投靠何定华的妹妹。何定华的妹夫为陕西师范学院院长，妹妹也是延安出来的干部，但他们都已被打成“走资派”。虽然他们自身难保，还是让何定华住了下来。何定华在西安住到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才返汉。期间，他化名“方兴”，只与笔者“单线”联系。除了这两个“大老板”，各系的“黑帮”则由各系的群众组织想办法。哲学系余志宏就是由笔者护送去其连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避难。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武大掀起了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高潮。

8月24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二千多名师生员工在学校小操场隆重举行“李达同志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为李达补发了讣告，补送了花圈，补行了三鞠躬，补致了悼词。追悼大会由笔者主持，松涛致悼词，副省长兼湖北大学校长孟夫唐，武大“三家村”“大老板”何定华，“三家村”“黑帮分子”余志宏分别讲话。

一个月后，9月24日，武汉大学工人战斗兵团、“赤胆忠心”战斗队、“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外文系“反到底”战团、物理系“穷棒子”公社、刘朝兵兵团、古立盛兵团、“井冈山‘烽火’”、中文系“鲁迅公社‘换新天’”战斗队、“无产者公社‘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数学系“农奴戟”兵团、长征兵团、“钟山风雨”战团等群众组织发起成立“为李达同志彻底翻案串联会”，并于同日发表《公告》，正式宣布“彻底为李达同志翻案”！

《公告》指出：“确凿无疑的调查材料证明，李达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地主’、‘叛徒’、‘三反分子’。李达同志早年脱离过党的组织，政治上跌过跤子，解放后在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但是他对党有感情，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非常崇敬。他恭恭敬敬地做毛主席的小学生，把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他晚年唯一的任务。不顾年老多病，做了大量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公告》强调指出：“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陶铸、王任重一伙在迫害李达同志的过程中，竟然倡狂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们公然把毛主席亲笔修改并且作了很高评价的李达同志的著作作为‘大毒草’来‘批倒批臭’，往毛主席脸上抹黑；公然违抗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几十万人的游行来‘声讨’李达同志，造成既成事实，向毛主席施加压力；公然威逼一些贫下中农，组成所谓‘代表团’，由走资派、四不清干部、伪甲长、汉奸‘带队’到武大来‘控诉’李达同志，借这些人之口来攻击毛主席；公然私拆、扣压李达同志给毛主席亲收的信件；公然隐瞒和违抗毛主席的指示，以非法手段把李达同志整死，杀人灭口”。

《公告》宣示：“陶铸、王任重策划的这一场大陷害、大骗局、大阴谋，欺骗了千千万万群众，流毒全国，现在到了彻底揭穿的时候了！”

“为李达同志彻底翻案串联会”整合了武大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取了数学系“农奴戟”兵团的谐音“龙”即“龙派”。而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因为有行政大楼的“虎山行”战斗队，便称为“虎派”。自此，武大形成了激烈的“龙虎斗”，直到1968年春开始的“壁垒森严”的武斗。

但是，武大部分群众组织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毕竟属于民间行为，并且随着67届毕业生分配离校和“工宣队”进校，不得不自行结束。然而，在全国清查所谓“5.16”反革命犯罪活动中，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乎所有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骨干人物和积极分子，无论是干部和教师，还是工人和学生，也无论这些人当时在哪里，都受到清查和打击，其中调离武大的干部、教师和毕业分配离校的学生，则是派人追踪清查和打击。他们中，有的被办“学习班”，有的被隔离反省，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后来成了“三种人”，有的甚至因为反复被批斗而积疾又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含冤而去！他们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

~~~~~

【不堪回首】

“老高三”四十年情结

· 吴 敏 ·

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作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初中在读学生简称的“老三届”，是一个同幼稚、盲从、狂热、不幸、磨难、倔犟等字眼，同“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一批人。而在这一批人中，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生简称的“老高三”，因为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是当年的一群正在“跳龙门”而又被全部重重地摔到了无底深渊的“鲤鱼”，其经历更坎坷、更具有悲剧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创伤更明显、更严重。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都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刀痕，都是一个使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彷徨、痛苦和不确定性的命运“拐点”。俗话说“六六大顺”，然而，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我虽然不知道其他“老三届”和似乎很健忘的一般中国人，会不会将1966年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里，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老高三”，所以，我真切地知道，绝大多数“老高三”几十年来的人生道路都走得很崎岖、很艰辛，都有一种终生难以痊愈的一想起1966年就会隐隐作痛的“心病”，就像因刀斧棍棒敲击而留下的疮疤会在阴雨天难以忍受地疼痛一样。

“老高三”至今已整整40年了，这个“心病”没有因时光消磨而淡化和减弱，仍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当然，极少数“老高三”或因出身于豪门、或因个人运气好而在几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活得很顺利、很滋润，他们的1966年情结可能比较淡薄一些。但是，1966年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挫折，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也具有负面意义。我在和此类“老高三”接触时，一谈起1966年，他们亦是耿耿于怀、感慨系之。显然，“老高三”现象是一种浸透着浓重社会文化内涵的绵绵情结，很值得思考和分析。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持续40年之久的“老高三”情结呢？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深造无疑是一种关键性、根本性的际遇和基础。然而，正是在“老高三”们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需要缺乏理性、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去冲锋陷阵，去造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老高三”以及整个“老三届”正处于青春躁动期，是一群傻小子，最适合于被利用。因此，正常的教育秩序因“革命需要”而被打乱了，高考制度被废弃了，包括“老高三”在内的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学生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在当时的最高决策者看来，为了实现“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崇高目标，几十万“老高三”、几百万“老三届”牺牲自己的学业，到“文化大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仅义不容辞，而且是一个锻炼成长的“好机会”。伟大领袖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仅仅在师范学校毕了个业，可他老人家的雄才大略及所创立的丰功伟绩，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与之媲美呢？

记得1966年6月17日清晨，我们班的同学们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起了床，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冲刺。我们的毕业考试、体检、填报志愿等程序早就搞完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着十来天后就要冲上高考的战场了。由于1965年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这些高三学生大都没有什么考前的畏惧感，而是满怀着愉悦的心情企盼和设计着美好的未来。尽管同学们复习功课都很认真、很下功夫，但这主要不是出于害怕考不上大学的后顾之忧，而是想力争考一个好学校，以检验并证明一下自己的底功、能力和价值。有的已经被提前选送到新华社等单位去做“机要工作”的同学，这些天来实际上已经不怎么看书了，只等着过些时候接到通知去上班。突然，就在同学们刚刚坐到教室里准备复习时，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大家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味俱有，很不是个滋味。这就像是喜滋滋地正准备

迈入“洞房花烛夜”的“新郎官”、“新嫁娘”，猝不及防地被推到了黑云翻滚、风狂雨骤的野地里。而且，同学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按当时“文化大革命”风雨乍起、惊雷闪电的态势，半年之后进行高考的可能性很渺茫，很靠不住。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推迟”高考和“停课闹革命”以后，全国各地中学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气氛陡然升级，“红卫兵”、“破四旧”、“红色恐怖”等均由中学生发起，在中学里折腾得最厉害，中学里被学生批斗、羞辱和折磨致死的教师的比例较之大学里要高很多。我们班的化学老师赵崇印，就是在被初中班的同学批斗之后忍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极大侮辱，硬是在单身宿舍里用榔头砸碎自己的脑壳而自杀的。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去到现场，只见屋子里的墙壁上尽是血迹和脑浆，惨不忍睹。我们的老校长郑云萍在挨批斗之后也跳进了学校的水井里想自杀，因被发现得早而没有死得成，又遭受了多次更严厉、更残酷的批斗，弄得他真是“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所在的那个不大城市的各个中学几乎都发生了教师被批斗致死的惨剧。有所中学的一位女老师经历了多场批斗，疲累至极，不能走路，仍被一群学生拖在地上四处批斗，拖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还不罢休，终于被活活地拖死了。全国各地中学里发生的情况，基本上也大同小异。而且，中学里的“革命造反组织”（我校的主要组织名称就叫“反到底”）还很快就同社会上的其他造反派联系到了一起，又是游行示威、围攻党政机关，又是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将原来正常的社会秩序搅扰得狼烟四起、天昏地暗，“走资派”、“黑权威”和“牛鬼蛇神”们都被搞得威风扫尽、“臭不可闻”。实践证明，被“红卫兵小将”等高帽子和受伟大领袖亲自检阅等无比荣耀激励得晕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三届”、“老高三”们，的确是给自己心中的“红太阳”交上了一份成绩斐然的答卷。

高考“推迟”半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由“批斗牛鬼蛇神”、“大串联”升级为翻来覆去的“夺权”和愈益剧烈的“全面内战”。我校所在的那个地区和城市的“夺权”和“反夺权”（并不是反对“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是反对由另一派夺权，要求由自己这一派夺权）斗争非常激烈，在相当长时间里你来我往地呈僵持和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两派的“武斗”也逐渐升级，发展到了动用迫击炮、装甲车等武器真枪实弹地互相开火、攻城略地，双方背后的军队实际上也卷进去了。有的军人常常换上便装、带上抢枝弹药，参加到所在一派的“武斗小分队”里去“执行任务”。在武斗最厉害的那一段时间里，三天两头有打伤人、打死人的消息传来，大家当时似乎都已经麻木了，习以为常了。我校的一名初中生返回住地时不小心踩上了自己这一派埋下的地雷，当场就被炸死了。我的两个初中同班同学在本市的另一所中学读高三，他们都曾被对立一派的“武斗小分队”抓了俘虏，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性命。据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不少地方和城市的“武斗”甚至比我们那里还要厉害得多。在这种愈来愈恶劣的情况下，原先关于“高考推迟半年”的许诺根本没有人再提起了，早被扔到爪哇国里去了。

到了1968年后半年，严重混乱的局面稍微平稳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已经胜券在握，不再需要“革命小将”们去上火线打头阵了。但是，小将们业已被激发起来的亢奋心态和“天不怕、地不怕”精神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遏制，这对于掌权的新贵们反而成了一种负面力量。为了把这股凶猛的洪水疏散开去，最高决策者采取了一种很便捷的办法，就是把“革命小将”们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我所在山西省的工矿企业比较多，中学生原籍农村的也比较多，所以，在1968年没有将“老三届”整体发配到农村去，而是将其分作了两部分：父母系农村户口者回老家务农，父母系城市户口或极少数情况特殊者被分配至厂矿当工人。父母都是农民的我，本该回老家“修理地球”，侥幸遇到了一个机会，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高三”为了生存而“飞鸟各投林”，累累若丧家之犬，1966年6月17日之前忙着准备高考的情况完全成了遥远的隔世之梦，想都不敢想了。我们班的同学们散伙分别、各奔东西时，大家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连一张临别的全班集体合影照都没有留下。同学们谁也

没有想到，自己初中毕业后踌躇满志、兴致勃勃地上高中、奔前程（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刚渡过，除师范之外的中专学校概不招生，高中的招生数量也很少，许多县都是只招一个高中班，很难考），五年之后竟然落了这么个下场。至于恢复高考，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66年之后11年的事情了。但此时的“老高三”们已到了“而立”之年，绝大多数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过日子，生存状况很艰难、很窘迫，有几个人能重振鸿鹄之志并丢老弃小、抛妻别子、义无反顾地去考大学呢？植物开花亦有时节，如果开花时节遭遇冰雪严寒的惨重袭击，枝叶凋零，花蕾尽落，过几个月以后再让其重新开花，那委实是“唉吁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我爱人也是一个“老高三”，她的一个同班同学1977年时正在一个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他下了很大决心准备参加高考以改变自己眼下的穷困处境，但步行几十里来到县城以后，左思右想，实在不忍心把务农的老婆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扔在家里受煎熬。于是，他找到我爱人的办公室里，絮叨了一番自己的苦衷后，身心疲累，情绪茫然，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子，根本没有去考场就打道回府了。我爱人的另一个同学倒是参加高考并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但他上了不到一年的学，老婆、孩子在家里的日子苦不堪言，他只好办了退学手续。类似此二位的经历，在“老高三”中决不在少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班30多个同学，我所知道的在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并上了大学的只有4位，约占十分之一。而且，恢复高考后各大学录取学生有一个未成文的默契，都不愿意招年龄大的考生。“老高三”是参加高考队伍中的年龄最大者，他们即使高考成绩很好，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大学。我们班那4位参加高考的同学，有一位情况特殊上了北京大学，另三人上的都是本地的末流学校。可以想像，当绝大多数“老高三”看着比自己年龄小很多者纷纷走进了自己11年前就应该走进的考场和大学时，其内心的苦涩和酸楚是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比“老高三”早一年的1965年高中毕业生近乎全部地顺利考上了大学，但他们只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停课闹革命”了。1963、1964年考上大学者，基本上都到农村去参加了一两年左右的“四清”，其在校学习时间和1965级大体相同，比“老高三”多不了多少。这一批“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大学在读学生，通称“老五届”。有一个和我很熟悉的1964级“老五届”曾亲口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个高中毕业，和你们差不多。”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不久，中央大规模地实行领导干部“四化”，既年轻又有文凭的“老五届”被整体性地提拔到了各级各类领导岗位上，并且在此后20年间越来越成了全国各层次、各领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岗位上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官运亨通，而且由于他们的荫庇，其远近亲属都生活得很优裕、很风光。相比之下，“老高三”却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们较之比自己年龄稍大的“老五届”，因为没有文凭而在各方面越来越被摔到了社会下层；他们较之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因为在年龄方面处于劣势，竞争力又越来越趋于弱化；他们要得到自己应有的“社会回报”，一般都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奉献和辛劳；而改革开放的“成本”和“代价”，则往往都要摊到他们的头上。因此，在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队伍里，在小学教师“裁员”的队伍里，在各单位分配住房老也轮不上的队伍里，在孩子上大学需要交学费、家里住房子需要讨腰包而自己实在是囊中羞涩的队伍里，在以年龄划线必须提前退休的队伍里，以及诸如此类各种各样“倒霉事”的队伍里，往往都能看到“老高三”的身影。当这些“老高三”远远地仰视着那些实际上并不比自己在学校读书时间多多少的“老五届”飞黄腾达、鲜花着锦的身影时，他们心里无疑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压抑、郁闷和烦躁。

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过于巨大和强烈的精神刺激、心理压力，使得相当一些“老高三”愈来愈承受不住了。我们班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姓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弱书生，学习很用功，成绩很优秀，性格内秀而在政治上、理论上比较早熟。记得大约在读高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啃大部头的马列著作，被同学们戏称为“宋克思”。若不是“文化大革命”，



他必定能考上名牌大学。1968年以后，他到一个工厂当了工人，被分配的工种是开天车。因其胆子比较小，对高空作业很恐惧，他多次向领导要求改换工种，但那个“大老粗”的顶头上司以“不安心工作”为由，硬是不同意。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下了很大功夫自学中医，并在全县的统考中名列前茅，具备了行医资格。他以此为据要求到厂医务室去工作，领导上还是不批准，仍然让他去开天车，这使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熬不出头了。再加之家庭关系又不太和谐，所以，他于1976年一气之下回到乡下老家，关起门来上吊自尽了。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文静而寡语，1968年以后到煤矿当工人，在井下当了一年多挖煤工后被抽调到了本矿的科室工作，命运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其妻子没有上过什么学，比较粗野，家庭关系很糟糕。这位同学到煤矿工作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的气，回到家里又要没完没了地受老婆的窝囊气。在气上加气、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终于在1980年代末期跳楼自尽了。这两位同学寻短见的直接原因都与其特定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以及性格弱点有关系，具有某种偶然性，但这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导致他们如此结局的真正根源实际上还是1966年那场灾难。可以想见，在他们两个最后下决心走上绝路、命归黄泉之前，一定作过长期、反复和痛苦的思想斗争，一定会多次诅咒1966年那个令其命运发生根本转折的可恶的年份。如果没有爆发“文化大革命”，他们两个在1966年正常地上了大学，必然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家庭环境，决不会年纪轻轻就走上了不归路。

我们班30多个同学，1968年离校之后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迄今为止我知道下落者或多或少有些联系者只有20多个人（不知道下落的那将近10个同学，现实处境可能更加不如意。因为，按一般常规，处境较好者都会主动与同学们联系的）。在这20多个同学中，除上述已自杀者2人之外，20岁出头因公致残、双目失明、终身吃劳保者1人，50岁出头病逝者2人，占了大约五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全国的“老高三”中决非偶然，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典型和普遍意义，可以说是“老高三”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

显然，将“老高三”同1960年代以来毕业的任何一届中学、中专更遑论大学本专科毕业生相比，甚至同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包括战乱时期在内的任何一届中学毕业生相比，其命运的持久悲怆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自1966年以来，在漫长的40年悠悠岁月里，幸运之神一次也没有顾及过“老高三”群体，而尴尬磨难遭罪之事则一次也没有把他们忘记和落下。

“老高三”这批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两三年，在1950年代伊始就朦朦胧胧地有些记忆了，是牵着共和国衣襟长大的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灿烂的朝霞，给他们的幼年、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和幸福；“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风烟和“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使他们在少年时就初尝了生活的艰辛；“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混乱、动荡和阴谋、诡谲，在他们青年时期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重重的创伤和烙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巨变及其愈益显露的负面代价，让他们的中年既觉得重逢机遇、愉悦欣喜，又感到不堪重负、心力憔悴和无可奈何。现在，“老高三”们已是将近“耳顺”之年，正在逐渐步入“夕阳红”的队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显然早就被“边缘化”了，不可能再对社会有多大贡献了。但是，在他们的身上，真实、清晰地保留和展示着新中国成立57年来寒暑冷暖、阴晴雨雪的“年轮线”。他们保留和展示这些“年轮线”，不是为了炫耀，不是在发牢骚，不是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的苦难，而是想真实地倾诉和记述历史，想为对其感兴趣者特别是正对社会实践进程承担并发挥重要责任者提供一份进行研究和参照的“活化石”。细细观察和琢磨这块“活化石”，特别是通过它透视绵亘40年之久的“老高三”这种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对正确反思新中国成立57年来曲折、艰辛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实中国社会因处于转型关键时期而产生的诸种矛盾、困难及问题，得出一些有益的启迪和警示。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大学教授）

~~~~~  
【难忘岁月】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四）

• 刘光耀 •

八、二进化肥厂

偃师的“文革”运动也是如火如荼。以偃师高中部分学生为核心的造反组织“八二五”，属于河南二七派，其对立组织被逼在陇海铁路北、县城东北邻的窑头村山寨上构筑工事设防。不少村庄的农民也被分成了两派。许庄村还发生了武斗，一个生产队损害另一个生产队未成熟的苹果。一位花白胡须老汉，在大街上对时局大发牢骚：“啥世道？！”一个中学生模样的青年指着他说：“老保老头！”老汉愤怒地举起手上的葱，瞪大眼睛回击青年：“我保我这把葱！你们反得啥？！真没见过这世道！”青年无语，溜走了。

在偃师得到一份二七公社印的中央领导接见河南两大派谈判代表时的讲话。周恩来总理说，河南十大总部是群众组织，二七公社和十大总部要团结，要向前看，向大联合走，向大联合看。陈伯达、康生也讲了类似的话。我把这些话摘录在卡片上。我认定，我们这些“老保”是忠于党和毛主席的，决不是“非法之徒”；八二四的错误是严重的，单靠八二四天下就不会太平；群众终究要联合。开封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一天，接到了红卫头头之一、物理系学生宋少展寄给我的信和一些传单。他希望我回开封化肥厂，同他们共同战斗。我在家实在待不住，就带着摘录的卡片于1967年9月11日重返开封。我在兴隆站下火车，步行到联合收割机厂附近，见一列十几个人的荷枪者，（当时我很纳闷：不知什么时候两派的棍棒、长矛都换成了钢枪，枪是从哪里来的？）我猜他们是左司的，就问：“去化肥厂怎么走？”他们说：“跟着我们走吧。”走到收割机厂门口，他们说：“天快黑了，今晚住我们这，明早我们送你去化肥厂。”我依了他们。次日我进了化肥厂。除了工人外，那里有师院红卫、井冈山的几十名学生，还有一些中学生。一位工人给我送来一套工作服，数学系学生用罩机器的布给我缝了一条棉被。我被安排在广播室里编辑稿件。

9月13日夜，八二四武装袭击联合收割机厂成功。此前他们已夺去空分、阀门、仪表、拖拉机机电各厂。至此，开封“老保”只剩下化肥厂一个据点。大家骂杨立勇“撕毁两派北京谈判协议”、“支持八二四武斗”、“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开封的蒋介石”。

两派都不乏神枪手，阀门厂经常从水塔的窗口向化肥厂打冷枪，一名中学生丧命。化肥厂则用钢管做炮、螺帽为弹打伤阀门厂的人。

郑州某空军师师长王洪智来到开封。他瓦解“老保”组织的手段特别高明。他让化肥厂左司头头周学礼的母亲和在七机部工作的周的弟弟住进化肥厂做周的工作。他又让开封师院数学系革委会给我母亲写信，让她来开封化肥厂做我的工作。他还亲自到红卫头头鲁枢元的家，让鲁的母亲做鲁的工作。周学礼的母亲和弟弟未能做通周学礼的工作。鲁枢元的母亲也未做通鲁枢元的工作。一天，我母亲进了化肥厂，一见面就说：“你伯不行了，快回去。”她见我神色骤变，赶快拉我到无人的地方说：“别害怕，你伯没事。”我放下心来。她说，她是解放军用吉普车从师院送来的，在附近一位八二四成员的家住了一夜，女主人对她很热情，给她做了很好吃的面条。她听女主人说，化肥厂里边男女作风很乱，吃的很紧张。其实，我们早就听到外边传说：化肥厂几个人啃一个烂茄子，不少人没有裤子穿，几个男的和一个人睡。我对母亲说：

“你先住下，看一看你就清楚了。”我们住的是集体房间。母亲被安排在一个大资料库的桌子上睡。第二天早上母亲对我说，她夜间几次悄悄到各房间门口、窗下听动静，根本不像外边说的那样。她看我的态度很坚定，就说：“我也不走了，在这陪你。”她每天和女炊事员一起干活，大家都很尊敬她。

一天下午，地理系学生吕志华告诉我，师院的大部分学生都和戴松成（外语系学生）一起离开化肥厂走了。正说间，周学礼的弟弟来了。他说：“真对不起，事先没给你们两个打招呼。你们要走，我现在就送你们。”我立刻明白了一切，严厉地说：“对不起，在我们身上立功小了点，还是在你哥哥身上立大功吧。”我起身向指挥部走去。头头们正在开会，听到周学礼说：“他们的后台还没有走。”我进了指挥部，周的弟弟也尾随而至。我板着脸冲周学礼说：“今天的事情就请你弟弟解释吧！”周学礼似乎猛然醒悟，立即从腰里拔出手枪对着他弟弟厉声道：“我毙了你！”挨着周学礼坐的二号头目罗登云赶紧抓住周的手脖儿。我扭头离开指挥部。接着，周学礼的弟弟离开了化肥厂。

10月的一天，王洪智带着姓陈的秘书进了化肥厂。他和蔼可亲，很像一位活菩萨。他见了我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指着工作服上“开肥”二字说：“你看，开封‘左匪’。”他没吱声。我离开他，立即上楼，提笔十几分钟写成了一篇广播稿：《口蜜腹剑者，滚开！》当即播出。女播音员的铿锵清脆的声音响彻开封上空。这篇文章还印成传单撒向市区。王洪智以为是鲁枢元写的，就拿着传单到鲁的家，气冲冲地对鲁的母亲说：“你看看，这就是你儿子写的文章！”当他后来得知是我写的时，更加恼羞成怒。

11月10日上午，周学礼、罗登云等几个头头被吉普车带到市内，王洪智向他们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军管化肥厂的命令和化工部致化肥厂职工的信以及刘建勋的指示。传达完后，周、罗被扣留，其余几个带着一大卷张贴用文件回厂。到厂内，他们分头到各片说明情况。我当即表示：服从。我要了一份文件让广播，然而停电了。转眼工夫，6093部队的战士冲进了化肥厂，几个战士站在了广播室门口。我问他们，为什么切断电源不让广播文件？他们不作声。我要上厕所，一个战士双手斜握着带刺刀的步枪，跟在我的后面。原来，在6093部队进化肥厂之前，王洪智已经向他们交代：要特别注意被称为刘老师的那个人，他戴眼镜。我认为他们不是按照中央精神保护我们、保护工厂，而是采用镇压的手段。他们让大家晚上坐车去师院十号楼。我让一个学生在被集中的群众面前向首长提出三点要求：1.不去师院十号楼，要去驻军大院；2.夜里不走，要白天走；3.不坐汽车，要步行。他们哪能听我们的。夜间，人们坐汽车走了。我和鲁枢元、武绍庆（红卫头头之一，政治系学生）留下，被关在一间屋内。我母亲就在隔壁，但不让我们见面。据说还有几个左司头头、三司头头小李和老工人杨成生，分别被关在另外几个房间内。第二天，他们让我母亲回偃师了。母亲离厂之前，王洪智去看了她，王说：“你那儿子坏得很啊！”母亲说：“我儿子坏不坏，我知道。他在这做坏事了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王洪智眼一瞪，悻悻而去。11月13日，下着小雪，地上全白了，我、鲁枢元、武绍庆和杨成生被某部尤参谋长用吉普车拉到十号楼，住在三楼东北角的一个房间里。前几天来的在二楼住。

开封市的“保守”组织的地盘被剿除得干干净净，王洪智立了大功。所以，后来江青夸奖王洪智是“杨子荣式的人物”。就是这个王洪智，曾通过他的老婆（开封师院艺术系教师）在开封师院为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选美女。

## 九、冬季的抗争

1967年11月份的开封师院十号楼，除了从化肥厂拉进来的人和6093部队看管这

些人的官兵外，没有别的人了。虽然这些人与外界隔绝，但并不感到寂寞。大家整天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在化肥厂时还没有那么多工夫。由于十号楼的结构，使我们经常听到和我们相对的二楼东南部的欢笑声，我们在走廊可以看见他们在二楼走廊的蹦跳，他们给我们打招呼。我们这个房间倒不太活跃，我们只能在三楼东北角一小段走廊活动，不能去二楼。二楼的人也不能来三楼。我们几个的饭菜由士兵送到房间来。二楼的人是在二楼大厅打饭，各自回房间吃。每到开饭令下，二楼的人就敲打着碗筷，吵着闹着到大厅集合，由吕志华整队，指挥唱几首歌，再呼几个口号：“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反对支一派压一派！”“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后才打饭。看管的官兵无可奈何他们。

开封市区的“左三红”始终没有停止地下活动。师院也有人在活动。他们想办法和十号楼的人取得联系。有一位看管我们的战士给我们带进了社会上的传单。一天，左司的新头头冯国治的小孩溜了进来，告诉我们，要组织大游行，希望我们配合。十号楼的人早就急着出去参加社会活动，和家人团聚，但看管者就是不放，还美其名曰，这是对我们的“保护”。我让那小孩去二楼悄悄地告诉一个他认识的人，组织绝食。其实，这个办法早已从二楼传来，我没同意。开晚饭的哨子响了，二楼走廊挤了一群人冲我们高喊：“我们绝食了！”我们的饭送来了，我说：“咱吃咱的，不管他们。”大家同意我的策略。在绝食压力下，首长答应，让各自所在单位的人来领我们出去。

十二月份的一天，我被叫到一楼首长办公室，几个数学系学生已经在那里。他们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满意，就吵了起来。首长说：“看样子，现在让刘光耀回系难以保证他的安全，今天就不回了。”又过了几天，数学系来了两位教师和我谈，他们没有提什么问题，态度比较和气。我打了借条，带上从化肥厂带出的衣被随他们出了十号楼，被安排在东工字楼65级学生宿舍住，受学生监督。第二天65级学生李柳辰发现我的棉被很薄，没有褥子，就让梁善道给我送了一条棉毯。不久，就有人借此事用大字报点名批判李柳辰。一天，我从宿舍出来散步，见一位士兵在我住的楼旁转来转去。他向我走来，说他已经认识我多天了，问我是不是偃师人，我们同乡。他从口袋掏出10元钱说：“你的经济一定很困难，拿上用。”我执意不要。看样子，他也是怕被人发现，我们就分开了。

没过几天，65级一位学生悄悄对我说，让我到中几排某房间去一下。我去了，那是一位电工的住室，相当安全。一位造反派不让参加毕业分配的井冈山头头在那里，我们聊了一会儿。以后，那里就是我的常去之处。我们在那里抄了一些赴京访问录和中央领导人讲话，由艺术系两位女学生贴出去。市内和我们联系也是通过那里。12月到1月，我到市内参加过几次左司头头的秘密会议，参与筹划了“左三红”的两次游行、集会活动；替他们撰写了《彻底纠正错误，为实现全市革命大联合而奋斗——告全市人民书》，在全市造成很大影响。此外，我还为井冈山起草了一份《上访提纲》。到1968年4月22日，师院革委会政治部政工组把它印发全院，并加了“编者按”，说它“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代表作”，要“批臭这篇大毒草”。可是，一直未见谁拿出批判它的文章，只是在批斗我的时候捎带了几句。（该文附后）

开封市和师院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主要是批判杨力勇在12月4日的长篇讲话里对形势、大联合、“左三红”的看法和态度。杨还说，“共产党就是靠打、砸、抢起家的”，以袒护八二四的打、砸、抢恶行。有一位教师的文章《斥“一不支持，二不扶植，三不反对”》，说杨所主张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八二四又见我经常不在宿舍，就怀疑我搞地下活动了。于是，他们派人专门跟着我，死盯住我的行动。我向跟我的那位同学说，我要去找军代表，他同意了。我们到办公楼，首长让我们在另一个会议室等他开完会再谈。在会议室，那位同学说我“反对毛主席”。我反驳道：“我

本来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人，是拥护毛主席的，可你硬要把我从毛主席身边推开，让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人少一些。你说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他无话可辩。他说他上厕所一下，警告我不要乱跑。趁他上厕所，我立即走出会议室到相距不远的校大门传达室。传达室有几位工人在那里说话。我对门卫师傅说：“有人抓我，我来躲一下。”他们把我藏在里间。那位同学到处找我，来到传达室问：“见刘光耀了没有？”都说没有。停了一会儿，工人告诉我，那个学生往北走得看不见了。我把已经写好的纸条（“首长：我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胁，只好离校回家。刘光耀”）交给他们，请转给首长，就走了。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